

# 海派文化孕育了宋氏家族

◆ 张炯强

本周末,宋氏家族7位后人聚集复旦,参加由复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“宋氏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变迁”学术研讨会。研讨会揭开了许多尘封已久的历史,其中,宋庆龄、宋子文档案将再度解密。



▲ 宋庆龄(前)与宋美龄早年在沪合影

在近代中国,当提及显赫一时的家族时,人们马上想到的一定是宋家。1931年7月23日,倪桂珍女士在青岛仙逝。宋母去世的消息立刻传遍中国,其讣告署名为:孤哀子宋子文、宋子良、宋子安,孤哀女宋霭龄、宋庆龄、宋美龄,适孔祥熙、孙文、蒋中正,孙女琼、曼、瑞泣叩。

子、女、婿中有如此显赫地位的母亲,可谓近代中国绝无仅有。而这些子、女、婿对中国近代构成了重大的影响,中国近代自晚清后的历史波澜起伏、峰回路转,无不与这些人的政治足迹息息相关。他们成为中国近代史中的主要人物。

宋家缘何名人辈出,是许多史学家、文学家的心中之谜。然而,如果我们现在再写一部《宋家王朝》的电视

连续剧会发现,多数场景聚焦在一座城市——上海。上海,曾经是宋家成员活动的主要舞台。从宋耀如回国,到宋庆龄留学回国,即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初,这三十年间,是上海城市最开放、快速发展的时期,是上海独特的海派文化孕育、成型的鼎盛时期。在清末,清政府管不了上海,传统思维束缚不了上海,上海思想活跃、风气开放、文化繁荣,这正是宋耀如事业开展、宋氏姐弟成长的时代。到了民国,无论是孙中山,还是袁世凯,还有其他人当总统的北洋政府,谁也治不了上海,又都离不开上海。上海富有、开放,这都为宋家成员接受教育、张扬个性、施展才华提供了难得的社会环境。

可以说,特殊的海派文化格局孕育了中国的第一家族,宋家其实是近代上海社会的产物。

## 求学

### 求学经历中的海派烙印

如果我们看一看宋耀如6个子女的出生地及其求学经历,就会发现当时深深的海派烙印。6位子女仅长女宋霭龄在昆山出生,其后也在上海长期居住、生活,而其余5人均出生在上海。可以说,到了宋家的第二代,他们已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。史料显示,6名宋家子女均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上海话。

再看他们的教育。宋氏三姐妹均在上海就读于中西私塾(马克蒂耶女校),随后赴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留学;宋家三公子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,同学中有顾维钧、荣毅仁、陶行知、林语堂、张爱玲、贝聿铭等,随后,三公子分别赴美留学,其中,宋子文、宋子安均毕业于哈佛大学,宋子良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。

20世纪初的上海,中西融合,兴办教育风行。当时,上海开办了许多风格各异的女学,为中国女子教育的开拓、社会风气的开新,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,而当时的上海圣约翰大学,其前身是圣约翰书院,后来成为上海乃至全中国的英语教育中心,社会上有“圣约翰英语”之说。上海的一些富家子弟,亦有留学海外的传统。显然,上海的教育文化,成为宋家6个子女成长的基石。

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熊月之认为,宋庆龄价值观、世界观的形成,主要是在中西私塾读书时期,她10岁至16岁。这所女校走精英教育路子,学生人数不多,1903年,学校只有两个班,一班14人,一班16人。从学生章程看,有三门课是自始至终必修的,即英文、算学与圣道(宗教),高年级时开始有地理学、天文学、历史学、化学等课程。章程规定学生必须参加礼拜等宗教活动,但是否入教由学生自主决定。章程还规定学生年满13岁必须住校,并对学生衣着、床上用品都统一要求:“学生铺陈,皆须照本塾式样名目,新制全套,专留塾中应用,直至不再入塾,方可携归。其式样名目如下,若能亲自来塾,阅看一过,更妙。

计开:大红绒毯一条;被

▼ 东余杭路上的宋家老宅

孙中钦 摄



子一条,长六尺阔四尺半;褥子一条,长五尺二寸阔二尺八寸……”

严格的办学,重英文,重宗教,重科学知识,重独立人格,中西私塾的这些特点,对于宋庆龄素质养成,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依据章程,宋庆龄至少从1905年起是住在学校的。住校,离开父母生活,这对于她独立人格的养成,也十分关键。

宋氏三姐妹,性格、志趣各有特点,差别很大,但以下四点是相同的:聪明、自信、独立、坚强。这些特点既得自遗传、天赋,更与后天的教育有关,与健全的人格养成有关。受美国文化影响,宋耀如对女儿的教育很重视,即使她们在美国留学,也经常会长信教育她们。倪桂珍出自传教士家庭,也使女儿们自小接触西方文化。追根溯源,宋家第一代的教育习惯,与近代上海特别的城市文化氛围有关。

宋耀如对子女的教育观,源自海派文化中的教育理念。宋家教育强调基督平等博爱思想和美国的民主精神,又灌输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传统思维,不以成就一己一家为满足,而以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为目的。宋耀如经常带着孩子们参观印刷厂、面粉厂、纺织厂,让他们开阔视野,了解社会。

倪桂珍对子女“严厉刚强”,而绝无“优柔善感”,是6个子女人生之旅的精神港湾。宋美龄回忆母亲时说:“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,与上帝非常接近。我认识母亲的伟大……这种常上教学的习惯,养成了我做事的恒心。”在父母的教导下,宋家6个子女,个个彬彬有礼,举止得体,气度非凡,高雅迷人。由于喜欢教育,1898年,宋耀如与长女宋霭龄合编了一份《上海儿童报》,文章都是孩子们的作品,这份报纸一直办到宋子良、宋子安进入圣约翰大学附中才停刊。



▲ 1933年宋庆龄在上海



▲ 宋庆龄纪念馆中展示的宋氏家族史料

孙中钦 摄

▼ 昔日宋庆龄在沪寓所 今上海孙中山故居



## 历史

### 历史事件造就人生轨迹

近代上海有着“东方巴黎”的美称,这里曾是远东第一大都市,风云变幻,重大历史事件不断在此上演,也造就了宋家人的人生轨迹。

20世纪初,正是宋庆龄在中西女塾求学的时代,在她学校的附近,张园的反清演说成了上海政治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,同时,又相继暴发了抵制美货、大闹公审会堂游行等事件,均深深影响了宋庆龄,造就了她的理想主义、爱国主义情怀。后来,美国记者曾问宋庆龄,当年为什么要嫁给孙中山,她回答:“被他并不是爱上他,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。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,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——但这是一个好念头。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,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,所以,我想帮助他。”这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表白。

20世纪20年代,革命党在上海活动频繁。1922年12月,在宋子文举办的一场宴会上,宋美龄第一次遇上蒋介石,蒋一见钟情,“被她的优雅外貌和愉快的谈话深深吸引”,以致于在日记中多次写上“今天非常思念美龄妹”。1927年9月23日,蒋宋定情成功,蒋又写下了“我们相爱,我认为这是一生最快乐的一天。”这场婚姻,把宋家与蒋介石的政治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。

此后的上海,国共破裂、日寇侵占,陷入了一场血雨腥风之中。宋氏家人的一幕幕大戏在此上演。三十年代初,宋庆龄高调反蒋,与蔡元培、杨杏佛、鲁迅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,积极营救爱国进步人士。宋庆龄从事这些活动始终无大风险,除了其特别的政治地位外,也有一个因素就是上海独特的政治格局。《宋家王朝》作者西格雷夫说:遗孀的丧服保护了她,但也使她如坐禁闭。她能够以他人做不到的方式冒险陈词。她曾激励过同时代的人们,但是当她们身遭杀戮时,她虽欲干预但又无能为力。她完全可以在巴黎这样的城市里过着富裕的流亡生活,了结此生。但她没有这样干。

1948年,国民党内战失败,财政危机。上海又暴发了宋家人的恩怨故事。蒋经国坐镇上海“打虎”,宋美龄则希望蒋经国与孔令侃兄弟间“不应相残”,结果,“打虎”之举功败垂成。这既是家族悲剧,亦是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前兆。

## 卷

### 保护遗迹,重组“宋家遗产”

由于上海是宋家成长、发展的大本营,上海的许多老房子都留下宋氏子女的足迹。宋耀如从川沙迁入上海的第一幢住宅位于虹口的东有恒路(现东余杭路),又称宋家老宅。宋家大约在1912年二三月间迁居至法租界宝昌路491号(后为霞飞路、今淮海中路)。1918年,宋耀如病故,倪桂珍率未婚子女迁居到西摩路139号(现陕西北路)花园洋房居住。1927年,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,宋子文购买了贾尔业爱路(今东平路)的花园洋房作为蒋宋的新宅。

在众多宋家旧宅中,最值得纪念的应是宝昌路的房产,可惜这幢楼房已经被拆除,位置约在茂名路以西、陕西南路以东。这幢房子有人认为是租赁的,但宋美龄曾在1917年写给友人的信中很肯定地写道:“我们在虹口有房子,霞飞路有房子,愚园路有房子。”又这样评价宝昌路上的房子,“我们的房子又宽绰又漂亮,而且备有各种现代化的设施。”她甚至认为这是上海最好的房子,4层楼、16个房间、美丽花园。1912年4月3日,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回沪,应宋耀如之邀就住进了宋家在宝昌路上的房子,当时报界关注到这一动向,曾纷纷报道,后来,这里成为孙中山的行营。1915年,宋庆龄就是在这幢房子翻出窗口,远赴日本与孙中山结婚的。1917年,宋家有一次难得的合家团聚机会,留下一张唯一的全家照,照片背景应当就是宝昌路老宅的客厅。

有历史及文化专家指出,宋家目前在上海保留的遗迹还包括孙中山故居、宋庆龄故居、宋家墓地等,如果进一步保护整理包括宋家老宅、宋子文别墅、蒋宋别墅等一批老房子,加上宋家在上海的一系列风雨故事,上海可以完整整理出一个“宋氏家族”文化路线图。而上海的文化培育了宋家,因此,重组“宋家遗产”,应是保留、发扬海派文化的一部分。

上海是宋家的诞生地、启蒙和恋爱喜庆之地。如今宋耀如夫妇安详地躺在沪西的一片翠绿中。宋倪原本希望子女们都能终老上海,陪伴左右。但由于政治纷争,眼下仅宋庆龄一人陪侍。人们祭扫时,想起这个情节,也许会发出无限感叹。